

# 民国清流

肆

## 大师们的抗战时代

汪兆骞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# 民国清流<sup>肆</sup>

## 大师们的抗战时代

汪兆骞 ◎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



现代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民国清流·大师们的抗战时代/汪兆骞著. —北京: 现代出版社, 2017.1  
ISBN 978-7-5143-5327-3

I. ①民… II. ①汪… III. ①文化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中国—民国  
IV. ① K825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61911 号

## 民国清流·大师们的抗战时代

---

作 者 汪兆骞  
责任编辑 张 霆 姚冬霞  
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 
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 
邮政编码 100011  
电 话 010-64267325 64245264 (传真)  
网 址 www.1980xd.com  
电子邮箱 xiandai@vip.sina.com  
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  
印 张 22.75  
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143-5327-3  
定 价 49.8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; 未经许可, 不得转载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/003

七七事变，抗日战争拉开序幕；胡适提出不要放弃河北；郁达夫、李叔同、张恨水、老舍担起民族救亡的使命

“为谁万里御风行”——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出访欧美五十一天，作五十六次演说 / 007

“燕山柳色太凄迷”——躲在苦雨斋观望的周作人 / 017

“云何色殷红”——弘一大师“为护法故，不怕炮弹” / 024

“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”——郭沫若、田汉参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 / 032

## 第二章 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/045

百城沦陷；汪精卫叛国投敌；名校南迁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建；梁漱溟、周扬、徐懋庸来到延安

“做了过河卒子，只能拼命向前”——胡适就任中国驻美大使首战告捷 / 049

“中国的甘地”梁漱溟赴延安访毛泽东 / 058

“为全节概而免祸累”——陈寅恪在香港宁死不事倭督和汪伪 / 068  
周扬、冯雪峰、徐懋庸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/ 078

### 第三章 民国二十八年（1939年）/ 089

国共摩擦加剧；吴佩孚拒绝汪伪邀请；周作人沦为汉奸；张爱玲、  
苏青和邵洵美与“孤岛文学”

“一生真伪有谁知”——方圆、冰炭集于一身的周作人 / 093

“忽而普罗，忽而民主，忽而民族”——写得一手漂亮小说的  
张资平 / 107

“孤岛”中的张爱玲、苏青和邵洵美 / 117

### 第四章 民国二十九年（1940年）/ 137

毛泽东发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；文化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；茅盾到  
延安；吴宓讲授《红楼梦》；老舍别妇抛雏，走上抗日征程

巴金说，“其实我并不理解他”——抗日战争中的茅盾 / 141

“聊报国家于万一”——张恨水改写抗战小说 / 151

“血若停流定是灰”——老舍别妇抛雏，走上抗战征程 / 162

“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”——对政治一向有兴趣的文人梁实秋 / 174

## 第五章 民国三十年（1941年）/ 183

民国教育文化大迁徙已过去四年；全国文化精英、作家、学者与亟待学成救国的青年学子云集于西南地区

《长河》是抗战文学最精彩的收获之一——沈从文在西南联大 / 188

“我想就是‘不苟’二字”——从日记中看“不苟”的爱国文人  
吴宓 / 199

被史学家忽略的文学批评家——因毛公鼎改变人生的叶公超 / 210

文学批评的一股理性冷峻之风——施蛰存的文艺批评 / 218

“君看白发诵经者，半是官中歌舞人”——尺长白髯飘飞的冯友兰 / 224

## 第六章 民国三十一年（1942年）至民国三十二年（1943年）/ 235

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；中美英首脑举行开罗会议；赵树理创作的小说  
是解放区文艺最杰出的代表

“搞到不让他吃公粮”——萧军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 / 240

“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”——萧红从荒原走向世界 / 254

“坐近一点嘛，明年不要再写《三八节有感》”——丁玲是座谈会  
重要人物 / 266

王实味、吴奚如的冤案 / 275

受邀请而不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——“狂人”高长虹 / 283

“一手攥笔杆，一手握驴鞭”的作家——赵树理的小说是《讲话》  
后的最重要收获 / 292

## 第七章 民国三十三年（1944年）至民国三十四年（1945年） / 307

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；郑振铎抢救珍贵文化典籍；马寅初剑指  
四大家族；郁达夫为国献身；叶圣陶、李劫人等给历史留下几个真实的  
镜头

“一腔热血，爱国不敢后人”——郑振铎在沦陷的上海抢救珍贵  
典籍 / 311

“敢言敢怒见精神”——雄视阔步于各种压迫下的马寅初 / 319

“白者嫌其已赤，赤者嫌其太白”——郁达夫的抗战生涯 / 332

“相濡以沫沫成海”——珍视友谊并为抗击侵略者的壮丽年代留下  
几个真实镜头的叶圣陶、李劫人等 / 344

民国二十六年（1937年），在滂沱大雨中，日本侵略军以军事演习为借口，悍然动用武力，突然攻占了北平的卢沟桥和宛平城。从此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大幕。中国人民历经八年抗战，艰苦奋斗，浴血奋战，最终取得彪炳千古的伟大胜利。

中华民族从血与火走向新生的特殊历史时期，中国的文学也担负起民族救亡的伟大使命。新文学运动由意识形态艺术流派而引起的复杂混乱的论争，也因适应战时条件而进行了调整，广大的爱国作家在创作上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时期的某些新的素质，共同承接着“五四”以来新文学的传统。

特殊的历史环境下，中国广大的疆土，当时被划分为几个不同的政治区域：国民党控制的国统区，共产党控制的敌后解放区，日寇占领的沦陷区，还有上海的“孤岛”（存在时间为从1937年11月日寇攻占上海，至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后日军侵入上海租界。这一时期的租界，四面都是沦陷区，租界内是英、法等国控制，故称“孤岛”）。这几个政治区域的社会制度与政治背景，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状态，故而不同区域的文学呈现了各自不同的面貌，但爱国主义是文学创作的主旋律。

1938年3月27日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（简称文协）在武汉成立。由各个方面代表共九十七人发起，会议选举朱自清、巴金、老舍、郭沫若、陈西滢、朱光潜、郁达夫、胡风等四十五人为理事，孙科、周恩来、陈立夫为名誉理事，由老舍主持文协工作。文协在全国各地建立了数十个分会。是年5月4日，创办文协会刊《抗日文艺》。文协的成立，标志着自由主义文学、民主主义文学、民族主义文学及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，组成了文学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。“民族”“救亡”焕发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，使抗战初期文学界变得空前统一，创作上洋溢着



昂扬激奋、鲜明单纯的英雄主义、爱国主义基调。

抗战中后期，随着战争转入相持阶段，作家开始正视战争取得胜利的艰巨性和残酷性，文学因此变得苦闷、抑郁，也变得清醒、凝重，现实主义精神得到恢复。作品大都以史诗品格的追求，来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。

如果说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凝重、沉郁，具有史诗性，那么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则具有明朗、朴素的风格，具有革命性。丁玲、周扬、萧军、柯仲平、荒煤等怀着对民主政治的追求来到延安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，与当地的群众性文艺活动相结合，使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。文艺性期刊纷纷创办，文化团体不断涌现。特别是1942年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发表之后，解放区文学艺术获得巨大发展。文学书写民族斗争、阶级斗争和劳动生产，表现工人、农民、士兵喜闻乐见的新生活形态、风貌，这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。

沦陷区一批作家在极为险恶的日伪政治高压下，坚持创作以抗日为主旨的作品，艺术上保持“忧患时的闲适”式的朴讷、苦涩。沦陷区文坛萧条冷落，并未取得多大成就。

1937年11月，上海被日寇占领。在上海，租界尚在各列强的管辖之下。碍于与各国的邦交，日本人的魔爪暂未进入租界，租界就成了“孤岛”。一部分留在租界的中国作家，仍在这里坚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，创作了很多文艺作品，史称“孤岛文学”。钱锺书的长篇《围城》、师陀的《结婚》、张爱玲的《传奇》，便是诞生在“孤岛”的优秀作品。

抗战时期，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，分割而并存。国难当头，炮火连天，文人有责守土抗敌，救亡压倒一切。他们没有情绪去咀嚼争辩文之长短、道之是非，也没兴趣品评、计较文学性、审美等显得不合时宜的问题，更抛却因政治背景不同而产生的激烈大论战。他们自觉站在民族解放的大纛下，捐弃前嫌，共同救亡抗敌。

第一章

民国二十六年

(1937年)

七七事变，抗日战争拉开序幕；胡适提出不要放弃河北；郁达夫、李叔同、张恨水、老舍担起民族救亡的使命



七七事变当日，胡适先应北平市市长秦德纯邀请，与文化界代表梅贻琦（清华大学校长）等共商形势对策。后又与梁实秋等应邀赶赴庐山，参加蒋介石召开的有关抗日的会议。胡适慷慨陈述了北平的情势、民情的激愤，提出不要放弃河北的建议。

郁达夫与杨骚在闽担任《救亡文艺》主编，四十七天撰写了二十多篇有关抗战的文章，抒“但使南疆猛将在，不教倭寇渡江涯”之志。

在厦门的李叔同（弘一大师），闻听卢沟桥枪声，即改寺庙居室为“殉教堂”，发愿与城市共存亡，“为护法故，不怕炮弹”，表达爱国忠心。

张恨水与张友鸾不拿薪水，创办《南京人报》，并创作《鼓角声中》《中原豪侠传》两部宣传抗日救国的长篇小说，弘扬“国难临头，必兴语言，唤醒国人”，“鼓励民气之意”精神。

在青岛的老舍，“别妇抛雏”，提着一只小皮箱，穿过敌人的炮火，赶到长沙，开始了八年流亡抗战的火热生活。

郭沫若在国民党的秘密安排下，从日本踏浪回到上海，写《民族的喜炮》一诗，表达“让诗人的声音像高射炮一样”射向日寇的豪情；田汉创作的多幕剧《卢沟桥》，为最早宣传抗日的剧本。不久，郭沫若、田汉到武汉，受命在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工作。

而在沦陷的北平，一直躲在苦雨斋中的周作人，不动声色地品着茶，看院内枣树上的枣由绿变红，内心却痛苦地挣扎着……



## “为谁万里御风行”——胡适以非官方身份出访 欧美五十一天，作五十六次演说

1937年7月7日，大雨倾盆，鲜血横流，七七事变爆发，抗日战争全面打响。

在极度紧张的局势下，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匆匆邀请文化界代表胡适、傅斯年、梅贻琦等人，在北平市政府商讨形势对策。胡适刚刚在4月18日的《独立评论》复刊号上，发表了关于抗日与国际新形势的政论文章《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》，预言日本称霸东亚与西太平洋的日子即将终结。七七事变让胡适有些震惊。他在会上坚持在《独立评论》复刊号上的观点。

是夜，大雨方歇，胡适又和罗隆基、陶希圣等在胡宅商量于7月9日前往江西九江庐山开会事宜。他们吃过晚饭，坐在庭院中开会。罗隆基对国民党应对七七事变态度不积极大为不满，言道：“国民党既不能不退出河北，何妨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。”胡适听罢，不以为然。他批评罗隆基，坚称此时此地只能跟着国民党政府进退，不能只搞什么党派活动（《胡适之先生二三事》，1962年2月6日“中央日报”）。

7月9日，胡适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乘火车取道天津南下。两天后，胡适夫人江冬秀在叶公超、饶毓泰、梁实秋、姚从吾等人陪同下，撤离北平，暂留天津租界。

7月11日，胡适抵九江，登上庐山。当日下午，蒋介石就举行茶会，

接见了胡适。

蒋介石对胡适经常批评时政，向政府争自由、争人权，是怀有不满的。不过，1936年12月13日，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，胡适即致电张学良，称：

陕中之变，举国震惊。介公负国家之重，若遭危害，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。足下应念国难家仇，悬崖勒马，护送介公出险，束身待罪，或尚可自赎于国人。若执迷不悟，名为抗敌，实则自坏长城，正为敌人所深快，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。（《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》）

接着，胡适又写《张学良的叛国》一文，指责张学良扣押蒋的行动是“背叛国家，破坏统一”（载于1936年12月20日《大公报》）。

那年，胡适写的几篇关于抗日外交方面的文章《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》《东京的兵变》《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——告日本国民》《关于〈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〉》《国联还可以抬头》等，深得蒋介石赏识。

茶会上，胡适慷慨激昂地向蒋介石陈述七七事变后民众情绪愤激的情形，主张不能放弃河北。蒋介石听罢，十分感动。王世杰后来在《我对蒋公的回忆》一书中说，蒋介石就在7月11日深夜，下定军事上全面抵抗日寇的最后决心，并即刻着手调兵遣将，开赴河北战场。

读胡颂平的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，得知1961年9月3日，王世杰请胡适吃饭，再次谈起“庐山谈话”。王世杰说，那次谈话对全面抗战产生了很大影响。

7月18日，胡适在庐山写了《独立评论》第二百四十四期的《编辑后记》，再次表示：

卢沟桥事件很少可以无条件地当为地方事件解决的可能，我们须有大规模的准备。这次我们不能有所割让，如此则又回到两年前的局面了，那还了得！

胡适郑重表示，完全支持并服从国民党全面抗日的决策。不过，胡适尽管抗击日寇的态度很坚定，言论也坚强有力，其内心深处仍对中国的抗战能力深怀忧虑。他的理智和责任心，促使他在全面抗战之前，为蒋介石谋划最后的和平努力，以争取时间积极备战，为残酷的战争积蓄有效力量。

胡适在会上多次发言，表达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襟怀。

为此，同组的胡建中当场赋诗一首赠胡适：

溽暑匡庐胜会开，八方名士溯江来。

吾家博士真堪道，慷慨陈词又一回。

胡适读罢，即写了一首回赠：

哪有猫儿不叫春？哪有蝉儿不鸣夏？

哪有虾蟆不夜鸣？哪有先生不说话？

其诗通俗意深，表达了渴望为国效力的心情。

7月28日，胡适下庐山，飞往武汉。

7月31日，蒋介石在武汉又约胡适、梅贻琦，以及陶希圣、陈布雷、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人吃午饭。席间，蒋介石告诉大家，他已决定对日全面开战。有人问，战事一开，国军能支持多久，蒋说“可支持六个月”。胡适闻之，心情颇为沉重。这与他先前的忧虑是吻合的。胡适不便在饭桌



上陈述他的忧虑，只是提出战要打，但“外交路线不可断”，争取时间，积蓄力量。

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

我们此时要做的事等于造一件 Miracle (奇迹)，其难无比，虽未必能成，略尽心力而已。

从这篇日记中可以看到，沉重地压他心头的，是一种悲观情绪，是对国家实力的悲观。同一天，他在给老朋友蒋廷黻的信中说：

苏俄预备了那么久，还不能不以避战为外交方针，何况我们这个国家……今日政府比廿四年更强了，但恐怕还没有强到一个可以忍辱避战的程度——又无政治家能担负大责任——故至今漂泊 (drifting)，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。

胡适对和平外交并不寄予太大的希望，他知道日本人灭我中华的野心不会因外交而改变。他只知道，国家孱弱，难以避免遭人欺侮，只有挺起自己的脊梁，抗击侵略者，要么在抗击敌人中灭亡，要么在血与火的圣战中重生。但是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不能放弃和平努力。

同一天，日本飞机轰炸天津南开大学，天津民众伤亡惨重。胡适极其愤怒地予以声讨，还发了电报给在东京的孟禄博士。孟禄博士是世界教育联合会的会长，正在东京主持世界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。胡适要求他在8月2日的开幕式上揭露日军在天津的暴行，并予以谴责与道义制裁。

8月6日，蒋介石再次邀胡适晤谈。胡适建议蒋介石不要断绝与各国的外交路线，在大战前再作一次和平的努力，以赢得时间，充足战备，以